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而不强”论

一个微观生产组织控制视角的分析

洪联英 著

长沙理工大学优秀学术著作出版资助

本专著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依托国际生产组织推进我国对外投资战略与政策研究》(项目批准号:11CJY095)的最终研究成果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而不强”论

一个微观生产组织控制视角的分析

洪联英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而不强”论：一个微观生产组织控制视角的分析/洪联英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6

ISBN 978 - 7 - 5161 - 6343 - 6

I . ①中… II . ①洪… III . ①对外投资—直接投资—研究—中国
IV. ①F832.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28231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侯苗苗
责任编辑	侯苗苗
责任校对	周晓东
责任印制	王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75
插 页	2
字 数	350 千字
定 价	5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全球经济结构变局下贸易、投资增长新变化	1
第二节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与加快推进对外投资步伐	4
一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与加快对外投资的内在关系	4
二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快速增长	5
第三节 中国对外投资“增而不强”的典型事实	7
第四节 一个新的视角：微观生产组织控制	11
第五节 本书的主要内容	14
第六节 本书的逻辑框架与关键问题	16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18
第一节 OFDI 与对外投资方式的选择理论	18
第二节 海外并购与跨国公司成长理论	23
第三节 企业体系权力理论	25
第四节 全球生产组织理论	28
第五节 本章结论	34
第三章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现状与问题分析	36
第一节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描述	36
一 对外投资规模	37
二 对外投资的区域分布	38
三 对外投资的行业分布	40
四 对外投资的企业主体	42
第二节 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式	44

一 对外投资的传统方式	44
二 对外投资的创新方式	45
第三节 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生产组织控制模式	46
一 等级制控制模式	47
二 契约制控制模式	50
三 混合制控制模式	52
第四节 对典型地区或国家的投资现状考察	54
一 中国对东盟投资现状	54
二 中国对欧盟投资现状	55
三 中国对非洲投资现状	56
四 中国对澳大利亚投资现状	57
五 中国对美国投资现状	58
六 中国对俄罗斯投资现状	59
第五节 对外投资的微观生产组织问题分析	60
一 企业所有权优势及其培育问题	60
二 区位优势及其选择问题	66
三 企业内部化优势及其整合问题	70
四 行业商会的组织作用不凸显	73
第六节 本章结论	73
一 总体态势发展概括	73
二 主要存在问题和障碍	74
三 依托国际生产组织破解困境的必然性和可行性	76
第四章 国际生产组织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	78
第一节 关键概念	78
一 国际生产组织的内涵	78
二 国际生产体系及其网络的内涵	79
三 国际生产体系下企业权力内涵	79
第二节 国际生产体系下的企业权力关系	83
第三节 国际生产体系下的企业权力理论：一个新拓展	84
一 企业所有权、物质资产与组织控制	84
二 网络进入权、组织机制与组织控制	86

三	价值链分解权、无形资产与组织控制	87
四	企业权力体系的构建	91
第四节	对外直接投资与微观生产组织控制分析框架	92
一	企业对外投资的组织控制方式	92
二	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	93
第五章	企业海外并购与组织控制：理论与实证	96
第一节	引言	96
第二节	企业海外并购发展的经验描述	97
一	海外并购发展历程	97
二	海外并购主要特征及发展趋势	99
第三节	海外并购的微观生产组织控制机制分析	106
一	基本模型与假定条件	106
二	企业行为与海外并购的组织控制方式选择	108
三	均衡条件分析	109
第四节	海外并购与组织控制方式选择实证分析	113
一	计量模型的构建与变量测度	113
二	数据来源与说明	117
三	实证检验结果及讨论	119
第五节	结论与启示	126
第六章	能源资源行业海外投资与组织控制：基于典型地区案例比较研究	128
第一节	引言	128
第二节	能源资源行业海外投资的总体特征	130
一	投资总量特征	130
二	投资行业特征	130
三	投资地区分布特征	132
四	投资企业主体特征	132
五	对外投资的组织控制方式	134
第三节	理论模型的构建与机理分析	135
一	基本假设	135

二	微观生产组织行为与网络进入权设计	136
三	进入权组织控制与专用性投资激励分析	137
第四节	境外投资与微观生产组织控制方式：	
	典型地区的案例比较	143
一	数据收集与研究对象选择	143
二	对非洲的能源资源投资案例	145
三	对大洋洲的能源资源投资案例	146
四	对北美洲的能源资源投资案例	148
五	对亚洲的能源资源投资案例	150
六	对欧洲的能源资源投资案例	151
七	对拉丁美洲的能源资源投资案例	152
第五节	结论与政策建议	154
第七章	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与企业“走出去”战略：	
	微观生产组织控制视角的分析	157
第一节	引言	157
第二节	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现状与特点	159
一	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的内涵	159
二	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发展历程	160
三	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总体发展态势	164
四	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特点	167
第三节	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与组织控制机制分析	170
一	基本模型的构建	170
二	微观生产组织控制的传导机制分析	173
三	均衡条件	176
四	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与组织控制问题经验分析	177
第四节	境外经贸合作区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183
一	评价指标体系设置的基本原则及方法	183
二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及权重	185
三	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的评价模型	186
第五节	评价指标体系应用：以泰中罗勇工业园为例	189
一	泰中罗勇工业园概况	190

二	园区的经验评估及其比较分析.....	192
三	园区指标的数据模拟及评价.....	194
第六节	结论及政策含义.....	199
第八章 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支持体系分析.....		203
第一节	引言.....	203
第二节	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支持体系现状考察.....	203
一	对外投资法律支持体系的发展现状.....	204
二	对外投资政策支持体系的发展现状.....	205
三	对外投资管理与服务机构的发展现状.....	208
第三节	对外投资政策支持体系问题分析.....	209
一	投资欧美地区的政策支持体系问题.....	209
二	投资非洲地区的政策支持体系问题.....	213
三	投资亚洲地区的政策支持体系问题.....	217
四	投资大洋洲地区的政策支持体系问题.....	219
第四节	发达国家的 OFDI 政策支持体系比较	222
一	美国的 OFDI 政策支持体系分析	222
二	日本的 OFDI 政策支持体系分析	226
三	德国的 OFDI 政策支持体系分析	229
第五节	结论与启示.....	232
第九章 推进对外直接投资战略与政策思路.....		235
第一节	引言	235
第二节	中国国际生产网络及组织机制构建与利用	235
一	以跨国公司为中心构建中国国际生产网络	235
二	中国国际生产组织机制的构建与利用	237
第三节	依托国际生产组织推进我国对外投资战略.....	244
一	推进政府实现政策功能转型	244
二	着力加强微观企业条件建设	244
三	加强微观生产组织控制功能和机制建设	246
四	引导企业理性选择投资区位和投资行业	248
五	提升政府全方位、多层次的公关战略.....	249

第四节 促进中国对外投资政策支持体系方案.....	251
一 对外投资的促进体系方案.....	251
二 对外投资的监管体系方案.....	254
三 对外投资的综合服务体系方案.....	256
参考文献.....	260
后记.....	275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全球经济结构变局下贸易、 投资增长新变化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正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经济贸易格局。从总体发展态势上看，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当前世界经济大幅下行，各国经济增长乏力。如表1-1所示，世界GDP的平均水平由2010年的3.8%下降至2012年的2.1%；发达国家GDP的平均水平则由2.7%下降至1.2%；新兴工业经济体GDP的平均水平则由8.2%下降至1.8%；发展中国家和独联体国家GDP的平均水平则由7.3%下降至4.7%；整个世界经济步入低迷。从结构上看，危机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一直在30%左右。但金融危机后的2010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70%，在2011年和2012年中，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产出的总增长中占了将近2/3。这就是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开始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全球经济重心正从发达经济体向新兴工业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转移。目前，世界经济在增长模式、政策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正在进行深刻的结构性变革。

表1-1 近三年世界经济与货物贸易增长情况 单位：%

	GDP			出口			进口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世界	3.8	2.4	2.1	14.1	5.2	2.1	13.6	5.1	1.9
发达国家	2.7	1.5	1.2	13.1	5.1	1.0	10.7	3.1	-0.1

续表

	GDP			出口			进口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新兴工业经济体*	8.2	4.0	1.8	20.9	7.8	1.6	17.9	2.7	1.5
发展中国家和独联体	7.3	5.3	4.7	15.3	5.4	3.3	18.2	8.0	4.6
中国	10.4	9.2	7.8	28.8	8.8	6.2	22.0	8.8	3.6

数据来源：WTO 秘书处。

* 新兴工业经济体包括中国、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关于新兴经济体，目前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英国《经济学家》将新兴经济体分成两个梯队：第一梯队为中国、巴西、印度和俄罗斯，也称“金砖四国”；第二梯队包括墨西哥、韩国、南非、波兰、土耳其、埃及等“新钻”国家。

随着全球经济结构变局，世界主要经济体外需萎缩，贸易、投资的增长出现了显著新变化：

一是全球贸易呈现出大幅下行和低速增长态势。如表 1-1 所示，2012 年全球贸易出口增速下滑到 2.1%，低于 2011 年的 5.2%，也低于 20 年以来 5.3% 的平均增速；进口增速也从 2010 年的 13.6% 下滑到 2012 年的 1.9%。其中，发达经济体出口量增长 1%，进口量下降 0.1%；发展中国家出口量增长 3.3%，进口量增长 4.6%。受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影响，2012 年全球货物贸易出口额为 18.3 万亿美元，增长率仅 0.2%，低于贸易量增速。2013 年，全球贸易弱势复苏局面难有大的改善。发达国家经济疲软将持续制约其进口能力；一些新兴经济体经济困难增多，将对贸易带来负面影响；贸易保护主义对国际贸易健康发展的威胁上升。WTO 预计，2013 年世界货物贸易量增长 3.3%，低于过去 20 年 5.3% 的平均水平。其中，发达经济体出口和进口均增长 1.4%，发展中国家出口量增长 5.3%，进口量增长 5.9%。

二是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活跃度下降，复苏势头受挫。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估计和 OECD 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2 年全球 FDI 金额下降 18.3%，约为 1.3 万亿美元，再次跌至 2009 年低谷时水平。2013 年，跨国公司对外投资信心略有增强，但在连续两个季度实现增长后，全球投资活动活跃度在 2013 年第二季度同比下降了近 1/3，当季 FDI 总额降至 2900 亿美元。其中，OECD 成员国对外投资较 2012 年同期下降了 20% 至 1550 亿美元，针对这些成员国的外国投资规模则下降了 26%，至 1370 亿

美元；而在非 OECD 成员国的 G20 国集团成员国中，外国投资下降了 92%，从 2012 年的 820 亿美元减少到仅仅 65 亿美元。

三是从未来较长时间上看，全球贸易增长面临严重挑战，对外投资却面临新的机遇。自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发生以来，欧洲、美国及日本三大主要市场经济状况都欠佳，尤其是欧洲经济陷入衰退，对全球出口造成较大影响。此外，在经济复苏乏力的情况下，一些国家为抢占市场、提高产业竞争力，频繁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严重制约了全球贸易的增长。2008 年 10 月至 2012 年 5 月期间，非关税措施占到贸易保护措施的 45.1%。^① 以中国为例，2012 年，21 个国家对中国产品发起 77 起反倾销、反补贴、特保等贸易救济调查，涉案金额 277 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了 11.6% 和 369%。2013 年以来，中国出口产品面临的贸易摩擦进一步增多，第一季度共有 12 个国家对中国发起 22 起贸易救济调查，同比增长了 22.2%。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不仅对世界贸易产生抑制作用，也导致大国之间的贸易争端频发。

相反，对外投资面临新的机遇。其一，国际经贸格局和经贸规则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贸组织框架下的多哈回合谈判步履维艰，但区域经济合作迅猛发展，围绕着亚太国家之间以及亚太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区域经贸合作成为热点。美国高调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协议（TTIP），并在这两个谈判中推出自由化程度非常高的新一代国际经贸规则。特别是全球投资规则面临重大改革，参与缔约国家大幅增加，投资协定涵盖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不仅包括高水平的投资保护，还包括更加自由的投资准入，以及环境、劳工、透明度、业绩要求、税收、金融服务等条款。这些新规则的引入和推广必将进一步促进全球跨国直接投资的发展。其二，金融危机后，各国对外资的限制放松，很多国家新出台了吸引外资的政策措施。各国还普遍加大了刺激经济发展的力度，纷纷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据亚洲开发银行、经合组织等国际机构预测，未来 5 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东中欧等新兴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将从 2012 年的 1.5 万亿美元增加到 3 万亿美元；未来 10 年，仅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就将达到 8 万亿美元的规模；2030 年，全球基础设施建

^① 参见张宇燕、徐秀军《2012—2013 年世界经济：回顾与展望》，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2 年 12 月 19 日。

设投资将达到 55 万亿美元。其三，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大国，中国对外投资快速发展。2012 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 18%，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却增长 17.6%，2013 年 1—8 月同比继续增长 18.5%。2014 年，中国境外投资总量超出外资引入，被称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元年。经济学者智库发布《中国海外投资指数报告》预测，2017 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净投资国，其海外投资规模将居世界第一位。

第二节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与加快 推进对外投资步伐

一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与加快对外投资的内在关系

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持续快速增长，但随着外贸、外资的高速发展，我国贸易全球化阶段基本完成，目前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内部需求不足，产业结构单一，产能严重过剩，资源环境破坏，高度依赖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然而，在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双重冲击下，外需急剧萎缩，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更加突出。具体地说，从经济增长结构看，在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中，外贸出口的大幅下降，是直接影响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从工业内部结构看，在外需收缩冲击下，钢铁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在建产能逆势扩张势头强劲，新兴行业盲目扩张明显。从企业组织结构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占比过低、势力不强，中小企业转型升级面临重重困境。这些结果表明，我国一方面迫切需要加快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主导，由加工型转向创新型的新模式；但另一方面，“内部需求提升乏力，产能严重过剩”的现实挑战又表明，在当前的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路径中，仍然需要一个消化渠道——国外大市场。这是因为，当前我国实施“内需主导型”发展模式尚需要一个过渡期。

从根本上讲，中国的发展归根结底要靠国内市场的繁荣来带动，这不仅是出于对国际国内经济现实的策略考虑，而且也是捍卫中国大国地位，保持中国经济持久、自主、健康发展，避免陷入依附性发展格局的战略需要。但是，当前我国采取“内需主导型”发展模式的条件还不成熟。其

一，从经济增长的潜力指标上看，高层次、创新型人才明显不足，教育投入和科研投资整体不足，影响着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近几年来，我国 15 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比 OECD 国家的平均水平低 3 年以上，而且从业人员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仅为 7.2% 左右，明显低于 2000 年 12.6% 的世界平均水平。城镇从业人员中技能劳动者仅为 32.9%，技师和高级技师只占其中的 4%。而在教育投入上，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 仅为 3.2% 左右，远低于发展中国家 4.6% 的平均水平；在科学研究的经费上，发达国家占 GDP 的比例已达 2%—3%，而中国则处在 1.2% 上下，其中的大部分又用于支持短期即可获利的应用性研究项目，造成基础科学研究经费严重不足。其二，从微观基础上看，企业准备不足。尽管我国多数企业已经初具现代企业管理体制和相应的治理机制，但企业生产率水平普遍较低，即使是中国先进企业代表，如中国石化、国家电力、中国工商银行等垄断企业，其劳动生产率均在国际行业首位企业水平的 4% 以下；人均营业收入和人均利润的国际差距很大，而且还含有垄断成分。如果从占我国企业总数 99% 以上的中小企业来看，劳动生产率水平更低。这一事实表明，中国企业并没有真正发展起来，自生能力较差，一旦将经营重心放在国内市场，难以支撑起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微观要求。一个明显的证据是，由于当前经济转型的步骤较快，近几年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大批中小企业生存步履维艰，相当数量的企业已经陷入非正常的歇业、停产甚至倒逼现象中。其三，从对外经济条件上看，尽管中国在货物贸易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转型时机和条件已经具备，但在技术和服务贸易方面，目前仍然还是处于持续逆差局面，表明我国服务业总体国际竞争力较弱，难以支持内需主导战略（洪联英、刘解龙，2009）。

因此，对许多有条件的国内企业来说，仅仅依赖国内市场已经不再是他们的选择。在贸易全球化已经完成的现实背景下，生产全球化或说对外投资不仅仅是企业行为，更是一个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产业转移的重要战略，或者说加快推进对外投资步伐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一环和现实战略选择。

二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快速增长

如上所述，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模式转型的需要，如何促进我国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战略转变，不仅是推进我国企业国际

化发展的重要方式，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鼓励企业开展境外加工装配、对外承包工程、境外资源开发、海外并购等业务的财政、金融支持政策和措施，鼓励企业通过海外投资获取石油、金属矿产等重要战略资源。特别是，2003 年商务部出台《关于做好境外投资审批试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2004 年国务院做出的《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对外直接投资体系法规、政策及配套措施；2006 年商务部筹资 200 亿元、分两批共批准 19 个境外经贸合作区，进一步把目前国有大型企业集团、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等各类企业对外投资齐头并进，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和各类企业“走出去”的积极性，有力地推动“走出去”各项业务的持续快速发展。

根据商务部统计，从 2002 年到 2013 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从 27 亿美元增加到 901.7 亿美元，11 年间增长了 32.4 倍。特别是海外并购，2013 年成为亚洲新霸主，其规模由 2002 年的 10.47 亿美元增长到 2013 年的 700 亿美元，11 年间增长了 65.86 倍。2013 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 156 个国家和地区的 5090 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投资领域从初期的餐饮、原材料、资源、能源类投资到产业链整合、品牌收购和技术引进等众多领域。对外投资方式也从单一走向多元，由早期的建点开办“窗口”，绿地投资、劳务合作、国际工程承包，发展到企业抱团“走出去”建立海外经贸合作区，较大规模的海外并购、股权置换、境外上市、设立境外研发中心、建立国际营销网络和战略合作等多种方式。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经济体。特别是 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明确提出，要“扩大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确立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允许发挥自身优势到境外开展投资合作，允许自担风险到各地区自由承揽工程和劳务合作项目，允许创新方式‘走出去’开展绿地投资、并购投资、证券投资、联合投资等”。由此可以预见，在未来的 10 多年中，必定会如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哈沙·辛格所说，“下一个重大转变会是中国的海外投资”，“中国的直接海外投资在不断增加中，可以改变全球的结构”（第二届中国海外投资年会，2012）。

第三节 中国对外投资“增而不强”的典型事实

如上所述，近年来中国对外投资发展迅猛，目前已成为全球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经济体，中国的对外净投资超过 17000 亿美元。尤其自 2004 年以来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对外直接投资体系法规、政策及配套措施，从而在简化对外投资审批程序、规范监督管理、放宽对外投资外汇管制、国家财税金融政策扶持、对外投资保护、对外投资综合管理与信息服务等方面都得到大幅改进，使中国对外投资方式和数量获得了快速增长。然而，与欧美大型跨国企业相比，我国“走出去”的企业大多仍处于中低端行业，多数是传统的承建商，高科技含量和高附加值的主营业务不突出，缺乏核心竞争力。尤其是近年来投资收入总体为负，2012 年的投资收入为 -580 亿美元。美国在 2012 年的对外净投资为 -4200 亿美元左右，而其投资收入却为 200 亿美元。德国 2012 年的对外净投资是 14000 亿美元，正在逐步赶上中国的投资量，其投资收入保持在 6%—8% 之间。换言之，中国对外投资发展“增而不强”，体现在：

其一是 OFDI 规模数量激增，但微观层面问题凸显，企业盲目投资和自相竞争，境外资产流失严重。随着政府大力推动和加快对外投资步伐，对外投资微观层面问题凸显：其一是偏离主业，企业盲目投资。在海外投资和经营过程中，一些中央企业投资追求短期利益，严重偏离企业熟悉领域和主业经营范围，投资过度向上下游延伸，盲目多元化，贸然进入金融、房地产等非主业领域，非主业投资比重过大，盲目多元化倾向严重。境外投资经营不够规范，一些企业盲目投资、重复建设，投资风险加大。其二是海外并购互挖墙脚，恶性价格竞争。随着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热情的高涨，在部分海外收购项目中，多家企业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与合作，进行恶性价格竞争，出现自相竞争互相内讧的情况。据国资委资料，“中央企业间境外投资的恶性竞争近年来屡屡发生。已经有好几个项目，本来我们的企业可以花 5000 万—6000 万美元收购的项目，由于央企之间的相互抬价、恶性竞争，结果花了 1 亿多美元”。对于中央企业互挖墙脚的问题，国资委已经多次提出警告，并酝酿直接出台相关文件。其三是海外经营巨亏，风险管理能力令人担忧。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亏损

事件频繁发生，如央企中铝公司增资力拓面临巨亏，中国航油大单原油期货合约巨亏，2010年10月25日，中国铁建发布公告称，公司承建的沙特麦加轻轨项目预计亏损达41.53亿元。许多企业在项目签约时只有概念设计，而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实际工程数量比签约时预计工程数量大幅度增加；业主大量指令性变更导致项目工作量和成本投入大幅增加，计划工期出现阶段性延误等，这说明中国企业的海外经营能力和风险管控能力令人担忧。其四是国有企业监管缺位，境外资产流失严重。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的管理和运营过程中，存在多重“委托代理”现象：央企是国资委的代理人，央企内部还有多级代理人，即国有企业监管缺位，治理结构存在天然缺陷。目前在海外投资中，除了中国五矿、华润集团等少数中央企业外，大多数中央企业境外资产的安全和增值都存在隐忧。^①此外，由于历史原因及境外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制度和国情差异，中央企业到境外投资采取的方式较多，有的还采取委托个人进行投资。因此，境外企业存在产权关系复杂、变通操作多、管理不规范、监管不到位等，境外资产流失已成为重要问题。

二是海外并购空前盛行，但缺乏整合手段，失败案例屡创新高。近年来，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萧条背景下，中国企业频频出手海外投资。据国际数据提供商 Dealogic 统计，2009 年中国公司发起的海外并购交易总额达到 460 亿美元，不少业内人士甚至称 2009 年是“中国海外并购元年”（李桂芳，2011）。而清科数据库 2013 年 1 月的数据表明，自 2006 年开始并购增长趋势明显，特别是 2011 年的并购总额较 2010 年增长了 14903.83 百万美元，达到 28098.92 百万美元，并购案例数量也增加一倍，由 55 次上升到 110 次。2012 年较 2011 年稍有增长，并购总额达到 29825.21 百万美元，两年合计发生了 222 次并购事件（如图 1-1 所示）。

然而，有关数据表明，在企业加快“走出去”过程中，中国企业至少有 2/3 的并购案例是不成功。^② 国际知名金融数据提供商 Dealogic 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 年和 2010 年中国企业跨境收购的失败率（指已宣布的

^① 李桂芳：《央企“走出去”：境外资产流失成大敌》，《第一财经日报》2011 年 10 月 24 日。

^② 据麦肯锡的研究，在过去 20 年，全球大型的企业并购案中，取得预期效果的比例低于五成，而中国则有六成七的海外并购不成功。国内诸多学者发现，中国近 70% 的海外投资是失败的（袁晓澜、徐芸茜：《中国近 70% 的海外投资是失败的》，《华夏时报》2009 年 12 月 25 日）。